

◎ 陈俊杰 著

关系资源与 农民的非农化

——浙东越村的实地研究

. 6
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内容提要

、本文的主题,是想探讨在农民的非农化过程中,“关系资源”所起的作用。选择这个题目,主要是基于这两个方面的认识:(1)在现实层面,非农化是农村改革以来一个重大的社会现象,一直受到学术界的高度关注。由于非农化并不全然是国家有计划的制度安排的结果,因而,在这一过程中,必然涉及到农民对于传统文化资源的充分利用。然而,这方面的研究,目前仍未得到人们充分的重视。(2)在理论层面,是想从农民对“关系资源”的设计与运用入手,以他们的非农化过程为例,揭示宏观社会现象在微观上产生、积累的内在机制。

这是一项社会学的实地研究。通过深入越村这个社区的生活,综合运用参与观察、个案访谈等实地研究方法,揭示了社区农民实现非农化的内在途径与过程,剖析了“关系资源”在其中所起的作用。在实地研究基础上,对有关的观点进行了分析与讨论,并从理论上对农民非农化过程中的行为策略,作出了分析、判断与解释。

全文共分九章。

第一章是导言。交代了研究的缘起与研究的意义。

第二章是文献综述。介绍了与本文相关的有关理论观点与研究成果。综述的范围横跨社会学、经济学、人类学和社会心理学等学科,对有关文献资料作了较为系统的梳理、归纳和分析,指出了它们和本项研究的关系。

第三章是研究设计。交代了研究的地点与研究假设,说明了研究的过程,阐明了研究的代表性与方法论问题。方法论问题是本章的重点,文中讨论了个案研究方法,分析了研究中的主位与客位问题,说明了对于研究结果的叙述方式,并指出了它们在方法论上的长处与不足。

第四章是社区概况。交代了越村所处的地方历史背景、社区人口及生活水平。

第五章,在社区及行政村层面,结合国家宏观政策的变化及地方政府的具体反应,描述了社区精英是怎样通过各种方法,在城乡间的壁垒中找到发展非农化的机会的。其中着重谈到了在集体化农业下非农化的必然性、大队干部的创业动机以及社区精英们的内部关系,这些因素都对社区的非农化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。此外,还简要地说明了这些非农机会,又是怎样在社区内部,以什么样的方式分配给社员的。通过这样的描述,大体上展现了越村农民非农化的最主要的外部环境,并引出了下章对于“关系资源”的探讨。

第六章对“关系资源”作了专门的探讨。为此,首先对“关系”本身进行了解剖,指出它在内在构成上,具有伦理、情感与利益这三个维度的内涵。由内隐到外显,“关系”具有三个层次的含义:在价值层面,蕴含着儒家社会哲学中“社会建构的基本原则”,具有文化深层的价值合理性;在规范层面,意味着种种与人相处的基本规则;在行为层面,意味着一整套丰富、具体、可操作

的“关系行为”。因此,从这两个方面看去,可以将“关系”理解成人與人(或群体、组织)之间,由于某种性质(伦理、情感、利益)的联系,而构成的带有文化合理性的相互关联的状态。这种看法,与我对人的理解直接相关。

但是,仅有“关系”,不见得就能成为“关系资源”。“关系”的维系本身就是人们日常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,从“关系”到“关系资源”,更是人们在生活中相互运作“关系”的一个结果。正因为如此,单凭“关系”在亲缘差序上的亲疏,不见得就能说明它在作为“资源”时的可利用的程度。它与其他两个因素——(1)行动主体对“关系资源”需求的内容、该内容对行动主体的重要性及其稀缺程度;(2)“关系”对象有无行动主体所期望的资源及资源的稀缺程度等等——结合起来,大体上决定了行动主体对“关系资源”运用的方式与技巧。

第七章,以尽可能详尽的个案,描述了作为越村“中产阶级”的小业主兴起的全过程。在此基础上,进一步展开了上一章中对于作为行动主体的农民如何使用“关系资源”这一问题的探讨,从中分析、提炼了“人情型酬报”与“交换型酬报”这两个概念。最后,指出农民利用“关系资源”设计自己的行为的过程,有如中医的“号脉”、“配方”。

第八章,以个案的形式,展示了越村“老板”们逐渐产生的整个过程。随后,结合本章及前面各章的材料,从三个方面进行分析与提炼:(1)通过对社区在80年代中期以后内部分化过程的解析,说明了“老板”产生的社区背景。(2)通过对“老板”运用“关系资源”的策略的解剖,指出在“老板”财富的增长过程中,“关系资源”起到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;而“交换型酬报”之所以能成为他们“关系行为”中越来越主要的酬报方式,是因为存

在着因此受到侵蚀的“第三者”——国家与集体。“老板”们对“关系技巧”的运用,反映了他们各自对于“关系行为”的设计方式,其目的,则是为了尽可能以最佳的优势来获取自己所期望的资源。在这个意义上,“关系”确实是一种“能影响资源分配的资源”。(3)在非农化发展的过程中,“非制度性空间”正在逐渐形成。它是农民与一部分“第三者”——国家与集体——的“代理人”,在这一过程中,成为不同程度的利益主体后,在寻求各自利益的过程中,逐渐建构、扩展起来的。“关系资源”也在这一过程中,获得了越来越大的活动空间,取得了越来越大的工具性“效用”,成为影响基层社会资源配置的一个重要因素。在“非制度性空间”里,“关系行为”已得到了普遍的认可与赞同,成了人们日常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。

第九章是本文的理论总结。对本项研究作了全面的概括,并对研究中所涉及的有关理论与现实问题,作了进一步的探讨。这些问题不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,都有着深远的意义。

序 言

陈俊杰同学在他的博士论文《关系资源与农民的非农化——浙东越村的实地研究》行将出版问世之际，请我作序。作为导师，我很高兴。因为非农化问题和“关系资源”问题，在当代中国，都是重大的社会现象，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关注。这篇论文是作者在长期深入实地调查的基础上，透过农民对“关系资源”的运用，来揭示他们非农化的内在过程与途径，并由此展开了对一系列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的探讨。他的研究不仅兼跨了这两个重要的前沿的研究领域，还通过创造性的理论构思，巧妙地把“关系资源”与农民的非农化挂起钩来，在这两个领域都作出了可喜的双重学术贡献，是一篇具有理论和实践价值的优秀的博士论文。

在以往的非农化研究中，人们总是用宏观的制度、结构因素，通过强调改革前广大农村的种种困境（如人地矛盾、集体化农业的危机等），来说明非农化的势在必行，进而提出一些相关的对策建议。这些研究都必不可少，对学术研究的深化，对实际问题的解决，也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。但对农民究竟是如何实现非农化的内在途径与过程这一基本问题，却缺乏应有

的重视。至于扎实、深入的实地研究，那就更为罕见了。作者敏锐地指出，主要由农村工业化所引致的非农化现象，并不是政府有计划的制度安排的结果，因此，农民为了获得稀缺的非农机会，必然要借助他们生活世界里的传统文化资源。用作者的话来讲，这些“传统文化资源”，就是“关系”。作者由此入手，通过大量的个案材料，对农民实现非农化的途径与过程，作出了令人信服的描述、揭示与解释。这不仅填补了非农化研究中一项重要的空白，还深化了我们对农民非农化的认识，对这一领域的研究起到了推动作用。

中国社会的“关系”现象，是当前社会科学一个备受关注的前沿领域，尤其受到国际学术界的重视。透过“关系”，可以解释中国社会许多既无法用制度结构因素、也无法用抽象笼统的文化概念作出深入、透彻剖析的现象。例如，如果不理解“关系”，就无法了解中国人的信任结构，它与西方市场意义上的“契约”，有着微妙的关联，然而又有着重大的区别。对于“关系”，在作者搜集资料的阶段，国内外学者已作过很多理念上的探讨，但对它的实际运作过程，几乎是个空白。作者在掌握这一领域的重要文献的基础上，对这一领域的研究进行了较为全面、深入的反思，对“关系”、“关系资源”、“关系”的内在构成等重要理论概念与命题，进行了富有创意的论述。作者对“关系”内在构成三维性的论证，对“关系资源”运用策略与逻辑的理论归纳，尤为精彩，充满洞见。作者笔下的“关系”，已不再是抽象的理念，而是社会生活中发生着实际作用的“关系”。比起以往的研究，作者的分析与提炼，具有理论的说服力和对现实生活的透视力，因而具有创造性，使“关系”研究深入到了一个新的水平。

为了这篇论文，作者在几年时间里，一方面克服种种困难，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实地调查；另一方面，在课题设计与研究过程中，又时刻关注调查的科学性，使研究的结果能经得起严格的科学逻辑的检验。正因为如此，他在研究设计中，详细地讨论了研究的方法与方法论问题，从认识论上的“可知”与“不可知”入手，逐次述及研究中的主位(Emic)与客位(Etic)、研究者的个人偏见等问题，最后一直讨论到对研究结果的叙述方式。在对这些问题的讨论中，作者一丝不苟、逻辑严谨，表明作者受过严格系统的专业训练，有着相当扎实的社会学理论与方法论的修养，具有出色的独立研究能力。现在，社会学方法越来越广为人知，但许多人(包括一些学过社会学的)以为社会学方法就是一项项具体的调查技巧，其实大谬。没有理论的方法是靠不住的方法。没有方法论的修养和方法论的意识，不可能真正掌握实际的调查方法，也不可能真正做好一项研究。

从上面这些方面可以看出，陈俊杰同学的这篇博士论文，是一本具有较高学术水平的研究专著。它对我国社会学学科的发展和建设，将起到促进作用；对有关的实际部门，也会提供不少有益的参考与启示。本书行文流畅，深入浅出，我愿意向广大读者推荐。

最后，在当前严谨的学术著作出版极其困难的情形下，中国社会科学院重视学术事业，慷慨资助本书的出版，我作为作者的导师，对此深表敬意。同时，对为本书出版付出了心血的责任编辑，致以诚挚的感谢。

袁 方

1998年3月20日

北京大学社会学系

自序

即将付梓的这本书稿，是我这几年情动于中走近生活所获体验的学术表达。佛说凡“业”必有“因”。“因”即是“缘”，起于“诸有情”。6年前，暮春时节，偶然的机缘，我走近了浙东一个水乡小村的生活。村里人20多年来所发生的巨大变化，叫我惊诧不已。在过往的岁月里，绝大多数村民的生活，都发生了重大的改变，变得越来越不像单纯向土地讨取生活的传统农民。他们那些年努力改变自己生活境遇的经历，在当时的我听来，宛如一则则的“传奇”。俗话说，好奇心是求知的源泉，可我那时已不再是一个单纯无邪的少年，除了惊奇，更有同“病”相怜的感慨。我原本就是一个不易忘怀的人，过往的人事常常会在心头涌动，他们的“传奇”唤起了我对往日生活的追念。与他们一样，在一个江南小村，也有过我二十年的生活。春播插，夏“双抢”^①，一年年按农时编排的节奏，同

^① “双抢”，是指七月末、八月初的抢收早稻与抢插晚稻。这两件事要在10天左右的短期内完成。这期间正值酷暑，农活多而重，又非“抢”不可，是一年最辛苦的时节。

样是我所曾经熟悉的生活。相似的生活经历，引发了“同情”的理解，这些“传奇”映照着我不忍忘却的过去。那些平凡的日子里，有得过且过的认命与无奈，也有偶一升起的惶惑与不安，更有怎么也断不了念的无尽的企盼。究竟是什么原因，使每个人的生活形态各一，分别成为今天的样子？还在少年时，有时，我就忍不住悠悠地远想。那回的田野体验再一次牵起我的凝思，逝者如斯的怅惘里，总挥不去恍兮惚兮的困惑，一天一天，一点一滴，梗在了心头。我开始追问、开始苦想这只拨弄“传奇”的“看不见的手”，想透过对他们生活的解剖，浇一浇自己心中困惑的块垒。今生只此一回，人同此心，我无法忘情。

在学术的语言里，村民生活的这一系列变化，叫“非农化”。我当时还一时感奋，给这村子起了一个学名：越村，因为浙东在历史上属古越会稽。对中国大量农民的非农化现象，国内外主流的理论，基本上着眼于单一的集体化农业的危机，倾向于从宏观的制度与结构因素上寻求解释，认为中国农村的种种困境，使得生计艰难的农民，有着在土地之外寻求好一点的生活机会的强烈愿望，而宏观因素的改变，使得他们的渴望终于能成为今天的现实。然而遗憾的是，这些制度与结构层面的因素只能证明中国农民非农化的客观必然性，却无法令人满意地解释他们在非农化上的种种差异。事实上，非农化至少包括这两个方面的含义：它一方面意味着农民在非农部门就业种类上的增加，另一方面又意味着他们在非农部门中地位差异性的扩大。对此，惯常的做法，是试图引入若干个人化的指标，如年龄、性别、教育程度等，认为是这些因素导致了彼此的差异。然而，这仍然只有统计学意义上的部分价值。回到微观，

仍然是一种不免于浮泛的解释。这还只是问题冰山的一角。更为致命的是，上述分析的思路，无法解释农民非农化的途径与过程，它客观上成了人们认识上的一个“黑箱”。

近几年来，随着对一系列现实问题（如民工潮等）研究的深入，人们越来越体会到人情、面子、亲缘关系等社会文化因素的重要性，似乎意识到正是它们构成了“黑箱”里最关键的要素。这一丝光亮吸引着我把目光投向对中国社会“关系”的研究。

70年代末以来，“关系”一直是海外中国研究的一个热点，近年来正越来越受到国内学者的关注。人们普遍意识到，“关系”不仅仅是人们在生活中惯常使用的文化资源，它同时还是建构我们社会的基本原则，蕴含着中国文化的深层意义，并渗透到了人们观念与行为的深处。“关系”是中国的“特色”，绕开了它，就无法适切地理解中国的社会与文化。然而，遗憾还是不少。强调关系重要性的学者，大都是想由此补充以往解释的不足，他们只是将它当作一个解释的要素，仍然有意无意地回避了对于实际过程的关注。专门研究“关系”的学者，自然花了更多的心血，取得了令人钦佩的成果。我们现在对“关系”的认识，也正主要是靠了他们的努力。可这仍不能全然浇去我心中困惑的块垒。

我知道，研究“关系”，在西方，主要是出于对中国社会的“好奇”，想经由这体现了中国“特色”的“大门”，抓住中国文化的要害；可对大陆、港澳台以及海外身上流着中国文化的血的华裔学者来讲，除开纯粹知识上的原因，还有着微妙的民族文化心理上的动因。一方面，顺着“关系”，可以一步步摸到我们在文化上的“根”，从而在心里产生一种原始的

亲和感。这种情形，并不只此一家。就我所知，很多从事社会研究的，往往不加思索，就“自然”地选择了农村。因为在感觉中，农村不同于变化剧烈的都市，还有着中国社会的“本来”。透过村落的日常生活，可以依稀感受到乡间的古老“传统”，从而在知识的探求与可能的社会参与感之外，有时，竟还能体会到一种粘连着怀旧与反思的文化审美感。另一方面，在“关系”研究中，还寄托着许多学者对社会科学本土化与中国化的抱负。他们当中，有的还只站在相对中性的立场，想通过本土概念的发掘与提炼，使它们学术化、科学化，能主动与现有的学科概念体系进行全方位的对话，互相“批评”，相互为用，丰富现有的知识体系，通过研究的实践，促成中西文化的融合。有的则还试图以此一步一步地抗衡西方中心的学术体系，摆脱客观上存在的学术殖民地的境遇，有着一神在学术上宽窄深浅程度不一的民族主义情结：在这种微妙的情形下，许多日常生活中观念与行为上的概念，如“报”、“缘”、“人情”、“面子”、“关系”、“孝”等等，都被当作本土特色的学术概念，受到空前的重视。它的是非得失，此处可不多论，但有一样，不能不说是遗憾。人们关注的，基本上还只是它们在行为上的意义，比较侧重它们对人们行为心理的影响。台湾学者还由此提炼了“家族主义”，“集体主义”等具有一定抽象度的概念。然而，这样的探讨却多少偏离了当时的初衷，没能由此有意识地、更加深入地探讨、把握中国社会与文化的深层结构。同时，由直觉、常识与逻辑都可推知，这些概念之间必然有着内在的、深刻地关联。但是，在这样的思路下，很遗憾，也同样被忽略掉了。“本土化学术概念”的提炼与积累，起码已落了不少的空。

回到单纯的学术层面，也仍然有不能不顾的缺憾。现有的专项研究，除开社会心理学者对种种“关系”在行为特征与倾向上的实证研究，大体属于理念上的讨论。在思路的逻辑论证上，往往搬用儒家经典上的条文。本来，由于一个社会有共同的文化准则，用蕴含着文化基本准则的经典去解释生活中的事象，也并无不妥。可这样做的前提，是必须有明确的条件限制。从类别上讲，儒家的经典属于我们社会的“大传统”，而生活中的“关系”，却是民间社会的“小传统”。“大传统”属于“制度化世界”（Systematical-world），制度化世界里的人是被规范界定的被动的个体；“小传统”则扎根于“生活世界”（Life-world），生活世界的人是能动的、与环境互为主客体的个体。大、小传统间的差异意味着，儒家经典上的文字，往往只可以用来说明“关系”的某些规则。这样的讨论固然可以使人明理，但与人们日常运作着的“关系”，仍是不很相干的两张皮。

这两方面的摸索，多少使我知道一些问题的深浅，之后的实地调查总算也一点点对上了路子。我开始明白，要触及问题的核心，必须首先回到越村农民的生活世界。可以作为立论前提的是，农村工业化及主要由此所引致的大量农民的非农化，并不是政府有计划的制度安排的结果，这一客观事实，决定了农民要获得非农的机会，必然要借助于种种非制度性的渠道，回到他们的生活世界里，求助于他们自身所有或可能有的“文化资源”。照我的理解，这些“文化资源”，就是“关系”。

不过，这仅仅只是问题的开端。正如没有历史的现实是虚假的现实一样，剥离了过程的存在，也是一种不真实的存在。“关系”是人的“关系”，人是生活中的人，因而，离开具体的生活世界谈出来的“关系”，最多也只是文字“般若”，难以修

成正果的。

本着这样的理解，在越村的多次调查中，我抱着走近他们生活的愿望，去一步步地理解社区的日常生活，努力使我能够“做”得相对地自如，避免过于生硬地接近研究的主题。我所以说“走近”而不是“进入”社区的生活，是因为这涉及到方法与方法论上的重大问题。从方法论上讲，人际之间究竟能不能有彼此的理解，在认识论上一直找不到十分肯定的说法。说“不能”，是因为神经只能及于皮肤，各自的痛痒尚不能体己切肤，遑论更高层次的“理解”？说“能”，是因为现在还是有比较切实的证据，表明一个文化还是有着相对稳定的价值体系，循着这一套价值体系，至少在社会学意义上，还是可以不太生硬地沟通与协作。这样，说到“理解”，总归是在“有”与“无”这两极间恍兮惚兮地晃动摇摆，程度的深浅高低，得看具体的情形。“进入”，是某种确定状态的表达；“走近”，只是某种过程的描述，可以有不同的程度与水平。比起前者，“走近”既显得坦诚，又比较贴切。从具体方法上讲，越村的调查中能不能尽量避免如吉丁斯（A. Giddens）所说的“双重理解”（Double hermeneutic）之类的问题，这样的担忧伴随着我研究的始终。对此，我想过于悲观自不是个出路，绝对的把握又寻不着，权宜之计，还是不要太确信一定会有彻底的“进入”，还是努力去“走近”社区里的人们，心里再存一点自知之明，在“走近”的同时保持一点认知上的“警觉”，首先把握好自己与村里人的“关系”。透过这层“关系”，再去一步步地接近社区内的那些“关系”。为此，我在文字的表达上，采用了第一人称叙述方式，含蓄地提醒读者，这毕竟只是作者个人走近社区生活的观察体验，并不能全然保证与事象的本来丝

丝入扣。这样做，在我看来，是一种更为切实的办法，尽管实在是不太“潇洒”。可真正的潇洒，是超越了实际利害得失的无可无不可，实地的研究总归要有所得，若无超卓的悟性、见识与经历，在实地调查中谈潇洒，恐怕还是凡人不可企及的“蓬莱仙境”。我的体会是，离开了这个问题，去谈研究中的主位与客位，总是不免有点奢侈。

在几年断续的田野工作将要接近尾声时，我直觉上相信已触及了研究的主题。多次的田野体验，增进了我对生活中的人的理解。我的体会是，人是一个复杂的能动的主体，他不只是“经济人”，也不只是“社会人”，自然也不只是一个只顾终极价值追求却不计较生活现实的人。生活的所有这些面相，构成了一个复杂的整体，生活中的人，要顾及伦常、牵念情感，还要汲汲于种种大大小小的利害得失。“关系”是人们生活中的“关系”，那么，它必然要蕴含人性的所有方面，渗透着生活丰富的内涵。这样，伦理、情感与利益，构成了“关系”的基本内涵。之所以如此，是因为正是这三者，构成了生活的基本面相，是我们天天面对的东西。

在这样逐渐“走近”生活的过程中，我一次次体会到，人的生活是一个连续的整体，“关系”总是在生活历程中不断被人建构的，因而任何一种“关系”，都蕴含着人的生活历史，蕴含着人的能动性。正是这种能动性，使农民得以运用“关系”，利用制度性的缝隙，去寻得非农化的机会，改善自己的生活境遇，逐渐成为今天这个样子。他们利用关系设计自己行为的过程，有如中医的“号脉”、“配方”。这是一个最能体现个体能动性与创造性的过程。这个过程，是主客体的交融，是历史与现实的统一。我越往近看，就越感到设计“流程”的复

杂。一方面，由于信息传递上的原因，他们对外界情形的感知，会存在差异；同时，在年龄、性别、知识、经历、性格、观念等方面，彼此间也会不尽相同。这就使得他们首先在对外在“形势”的判断上，就会有所不同——好比不同的中医会号出不同的“脉相”一样；其次，他们对行为策略的设计，也会因此而彼此相异——好比不同的中医会对同一个病人开出不同的“药方”一样；最后，在具体的“关系行为”上，也会有不同的风格、方式与技巧，从而导致不同的行为效果——这好比不同的“药方”会有不同的“疗效”一样。正因为这种个体间差异性的存在，使得生活中的“关系”，会有那么多多种“搞法”，有无限多姿的形式与风格。越村农民非农化的发展过程，正是这些“配方”不断产生效果的过程。他们的“传奇”之所以让人惊讶，也正缘于此。个体的能动性就这样结合外在的条件，通过在微观层次上持续的点滴积累，终于汇成了宏观社会现象的滚滚大潮。

本书的底稿，是我的博士学位论文。它是在导师袁方教授的直接指导下完成的。我于1986年考入北京大学心理系，次年转入社会学系，直到1996年夏天毕业，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所工作。在社会学系求学的九年中，一直承蒙先生的关爱，这篇论文更倾注了先生的许多心血。值此论文出版之际，我对先生的教诲之恩致以深深的感谢。在论文的酝酿过程中，得到了许多师友的启发，在此，我尤其要感谢叶启政老师、王汉生老师、刘世定老师和同窗好友陈午晴。当我的想法刚有点苗头时，是王老师和刘老师给了我启发与鼓励；当我对“关系”研究的理论前沿还相当模糊的时候，是叶先生开启了我的思路，给了我继续探求的信心，并从台湾大学给我寄来大

量的文献。叶先生学识渊博，有儒者之风，我在此遥祝远在北的他身心俱泰、事事如心。论文里有些重要的想法，是在与午晴无数次的讨论中一点一点地形成的。那么多回联床的夜话，那么多次无倦的长谈，是我记忆的夜空中亮闪的星星。我在此还要特别感谢爸爸妈妈，他们的挚爱是我永远的温馨，没有他们的理解、支持和长年含辛茹苦的资助，我不可能不顾生计地埋头读书，并坚持完越村的长期调查；特别感谢我的妻子震儿，她给了我生命的纯净和安宁，叫我拥有痴情的年轻。我同样忘不了为我调查提供种种帮助的几位挚友，可为了谨慎起见，我此刻不得不隐去他们的名姓，但他们永远走不出我的心。

我要感谢黄连建研究员与沈志渔副研究员的大力推荐，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所的多方帮助。我要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基金的慷慨资助，为我的著作提供了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这样一个难得的机会。我还要感谢陈旭明老师与张红老师，她们将为此书的出版付出辛勤的劳动！

论文于1996年7月2号答辩通过后，我一直想好好地修改一次，可惜总挤不出时间。我到工业经济所后，一直在努力适应新的工作环境与研究风格。今年秋间，得悉论文获得了出版的机会，欣喜之余，下定了好好修改的决心。可身体的不适一直迁延着我的心愿。现在，岁月的指针快到了牛年的尾巴尖上，我才勉强通读几次，小作删改，可心头的遗憾却又添了几分。拉杂的话说完了，尚祈各位师长和读者朋友不吝赐教！

陈俊杰

1998年1月22日晨

西八间房